

DMCC

贸易的未来

摘要报告

2026
在断裂中重构



本摘要报告精选并浓缩了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DMCC)《贸易的未来2026》报告的核心内容，综合了DMCC在迪拜、上海、法兰克福和圣保罗等全球贸易中心举办的12场圆桌讨论成果，汇集了200多位企业领袖的专业见解，并结合对其中130多家企业和贸易从业人士开展的调研结果编写而成。这份摘要报告涵盖完整报告的引言、执行摘要和四个章节的内容，以及DMCC 2026年大宗商品贸易指数和DMCC 2026年行业数字化指数的信息。



引言

十年前，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DMCC）首度发布了《贸易的未来》报告。

当时的结论与今天有所不同，但关注的重点相近：当时，人们期待区块链消除相关文书工作，而文书处理约占全球贸易成本的五分之一。金融科技被寄望能弥合贸易融资缺口。物联网和机器人技术被认为会大幅度简化供应链。全球经济重心也在转移。早前的《贸易的未来》报告指出，贸易的未来将更加数字化、更具可持续性，全球贸易重心也将持续向亚洲转移。

十年后回望，实际情况的发展十分复杂。核心启示是推动变革的力量很少沿着线性轨迹发展，也不会单独发生作用。贸易融资的数字化进程比预期缓慢。融资缺口不但没有弥合，反而扩大至2.5万亿美元后才趋于稳定。区块链并未完全兑现其承诺，尽管它发挥一定作用，但只是作为更广泛数字基础设施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如今这套体系以人工智能和分布式账本技术为核心。亚洲确实成为全球主要生产枢纽，随后又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重要区域。可持续发展也从企业承诺演变为一场争夺产业优势的竞争，因为对关键矿产、清洁技术供应链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掌控，其战略意义已可与关税或贸易协定相提并论。





根本变化在于贸易本身的属性：谁参与贸易、以何种方式参与、交易什么，以及遵循谁制定的规则。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南南贸易如今占全球贸易流量的35%，其增速已超过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从阿联酋到越南、印度等中等强国正在吸引投资，并引导供应链重新布局。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增长迅速。数字货币曾被视为区块链爱好者圈中的小众创新，如今正逐渐成为代理行体系的可行替代方案，而后者数十年来一直支撑着跨境结算。

然而，这一切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过去两年，全球局势的演变一次次超出预测者的预期。制度体系加速分化，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董事会的战略构想走向实际应用，能源基础设施也迅速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重要领域——这些变化的发展速度，都远远超过了最具前瞻性的预测。

我们邀请130多位企业高管和贸易专家，就未来一至三年的贸易前景，在“最佳情景”、“基准情景”和“最差情景”三种情景中作出判断，结果仅有4%的受访者选择了“最佳情景”。这一数字，成为本报告最发人深省地发现。最了解全球贸易的人士普遍认为，支撑过去十年全球贸易发展的环境已难以重现。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他们正重新布局未来。

十年前，世界的走势似乎是可以预测的——未来的贸易会变得更快捷、更加互联，但仍可清楚看出是属于同一个体系。今天，这个体系已经断裂，而正在重构的体系则呈现出根本不同的面貌。

欢迎阅读DMCC《贸易的未来2026：在断裂中重构》。

执行摘要

自上一版报告以来，世界并非只是发生变化，而是出现了剧烈转折。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推行大范围关税措施，但随即在法律层面遭到挑战，以及人工智能从实验阶段加速进入运营阶段，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断裂。全球贸易体系正在经历根本性重构。能够看清新格局如何形成，而非一味惋惜旧格局瓦解的企业和政府，将最有机会从中受益。

尽管局势动荡，贸易仍将展现韧性，预计其增长将在2026年放缓，并在2027年恢复，然而增长的特点正发生变化。2025年上半年，人工智能相关商品的扩张速度是非人工智能商品的五倍，服务出口的增长速度是货物贸易的两倍。下一波全球贸易将更加智能化、更加数字化、竞争更趋激烈，也更难预测。

回顾：2024年报告判断准确之处

在2024年报告中，我们预计有三股力量将影响全球贸易：区域化进程加速、广泛的供应链重构，以及数字服务和人工智能采用激增。

三股力量的发展方向都得到验证。区域化确实在加速，但驱动力更多是来自关税冲击，而不是渐进式地缘政治转移。供应链重构进一步加剧，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和关键矿产瓶颈增添了紧迫性。人工智能到来的速度更快，带来的影响也远超最乐观的预测。过去两年显示，变化速度几乎超过所有预测。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制度性弱化更为深入和快速，导致其自1998年以来首次未能续期“电子商务免征关税暂停令”。美国关税制度在法律层面受到不少挑战，重组速度也高于贸易政策专家的预期。与此同时，曾被担忧会继续扩大的贸易融资缺口并未扩大，维持在2.5万亿美元的水平。

未来两至三年影响全球贸易的四股力量：

- **人工智能已跨过运营化的不可逆临界点，并将带来更大的变化。**人工智能已从企业高层的战略探索迈向实际应用，而且更大的转变将会发生。随着代理型系统承担复杂决策，人工智能应用从广泛试验深化为特定任务集成，人工智能应用的先行者与落后者之间的生产力差距，将扩大为全球化、结构性的竞争力差距。
- **关税规则已不再有章可循。**特朗普二度出任美国总统与WTO被边缘化，已经拆散了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架构，并以双边协定、阵营化贸易和长期不确定性取而代之。企业应把局势升级而非问题得到解决视为未来几年贸易政策的常态。
- **韧性是评定供应链效率的新标杆。**供应链长期处于压力测试状态，如今又因美伊冲突而需再次重构。把供应链多元化视为一次性应对方案的企业，将在下一次波动中变得非常被动，把多元化作为持续性运营规范的企业，则将在结构上更具竞争力。
- **能源转型是一场产业优势之争。**从电动汽车和电池，到关键矿产和可再生能源，清洁技术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关键领域。中国、美国、欧洲和海湾地区今天锁定的供应链位置，将决定未来数十年谁胜谁负。



主要发现

- 全球贸易将展现韧性，但不会表现强劲。预计增长将在2026年放缓，于2027年逐步恢复，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和服务将成为主要驱动力。
- 人工智能已进入运营规模化阶段。人工智能应用的先行者与落后者之间的差距，在生产力、成本效益和市场情报等方面正不断扩大。
- 关税环境具有结构性不确定性，有鉴于此，企业应为持续波动作出规划，而不是期待常态恢复。
- 多边体系仍在裂变，中等强国、双边协定和区域阵营正在填补因此产生的空白，这同时带来波动与机遇。
- 供应链正在为增强韧性而重构，“中国 + N”模式已在多数行业落地，多元化成本的确存在，但随着模式成熟会逐步下降。
- 贸易融资缺口维持在2.5万亿美元的水平，与2024年持平，这仍是一项结构性限制，尤其影响中小企业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商。
- 下一代金融基础设施正在围绕分布式账本技术形成，包括数字货币和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CBDC）。
- 随着各国数据监管分化速度快于趋同速度，跨境数据流正在成为数字贸易的结构性限制。数字贸易协定正在填补空白，但拼凑式规则提高了合规成本，也割裂了人工智能和服务增长所依赖的数字贸易环境。

- 能源转型是必争领域，关键矿产和电网基础设施正成为新的瓶颈。
- 南南贸易正在悄然受益，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流量如今占全球贸易的35%，并已超过北北贸易流量。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AfCFTA）等区域贸易协定推进，这一结构性转变正在加速。

信心图景

我们请130多位企业高管判断未来一至三年哪种情景更可能出现。超过80%的受访者预计将出现基准情景，即增长缓慢且不均衡、成本上升、供应链持续调整。接近12%的受访者预计会出现最差情景，即冲突升级、关税和金融碎片化扰乱贸易。只有4%的受访者预计出现最佳情景，即紧张局势缓和、增长覆盖面广泛。企业并未按恢复到中断前的常态进行规划，而是在建设一个以中断为常态的经营体系。

调研发出的信号

政策不确定性是企业最担忧的制约因素。半数受访者把关税和保护主义措施视为贸易增长的最大约束因素，明显高于需求疲软（15%）以及成本压力（15%）。近四分之三的企业预计未来一至三年贸易将走向区域化、阵营化或双边化。预计

会回归全球化的受访者不足17%。地缘政治风险已成为关注热点，超过98%的受访者认为它是重塑贸易流向的重大或中等影响因素。在人工智能领域，关注重点已从它如何推动变革转为如何规模化应用。近80%的受访者预计人工智能将提升贸易量，但只有14%的受访者认为其机构对人工智能的使用已达到转型效果或整合水平。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战略压力主要来自产业而非监管层面，受访者认为下列因素重要的比率如下：清洁能源投资与制造能力（30%）、关键矿产集中度（21%）、产业政策分化（18%）、碳定价位列最末，只有9%。

贸易环境正在变得更具挑战，但适应者仍可找到可行路径。可能使基准情景转向更不利方向的触发因素仍然存在，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关闭、保护主义升级或人工智能投资出现调整，这些都是现实风险。那些把中断视为今后多年的运营常态、而非短期便能熬过的异常情况的企业，将更具有竞争力。

世界贸易新变局

数十年来支配全球商业的规则型贸易体系，已不再是企业决定从何处采购，以及在哪里投资和销售时的主要参照。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增加的双边协定、竞争性阵营、作为战略工具使用的关税，以及可能在短时间内重塑全球供应链格局的地缘政治热点。地缘政治格局的波动没有阻止贸易，但已从根本上改变了贸易形态。

特朗普 2.0：关税战没有终点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关税使用明显增加，保护主义也相应抬头。WTO的数据显示，目前接近五分之一的全球进口商品（19.7%）受到关税及类似措施影响，明显高于一年前的12.6%。2025年，美国在“美国优先”战略下，对多数进口商品征收10%的基准

关税，并对部分贸易伙伴征收更高的对等关税，目标是缩小贸易逆差。中国等经济体以关税和出口管制作出回应，另一些经济体则通过谈判舒缓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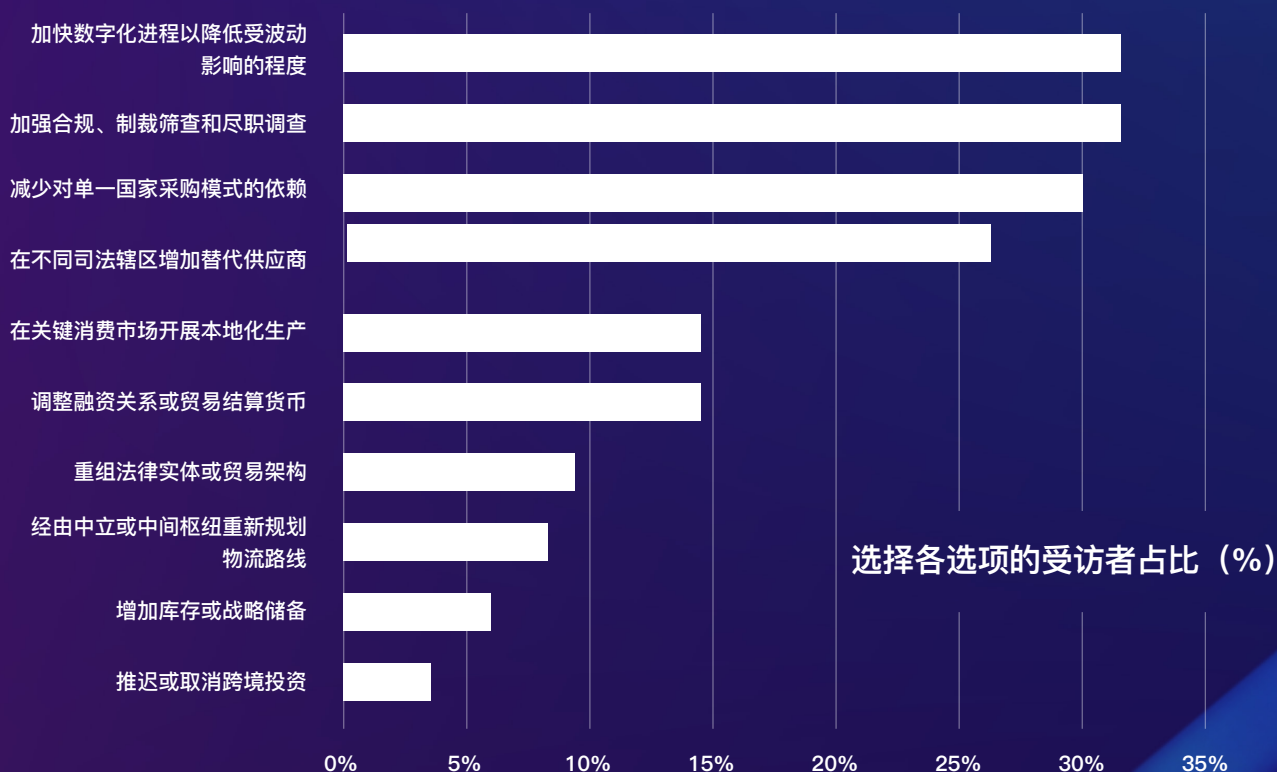
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 但环境仍不明朗

美国最高法院于2026年2月推翻了特朗普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而实施的关税措施，但数日后，美国政府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新的关税措施，并依据第301条启动两项调查，涉及美国90%至95%的进

口商品。从法律工具的切换速度可以看到，提高壁垒、政治主导贸易政策是政策方向，单一法院裁决难以扭转这一趋势。现在关税不仅是贸易工具，也成为一种外交政策工具。正如一位参加《贸易的未来》孟买圆桌讨论的人士所说：“和平状态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持续进行的谈判。”

图表 1

为应对地缘政治风险，贵机构已经采取或计划采取哪些具体行动？（可多选）



来源: DMCC Future of Trade Survey, 2026

中美竞争已进入风险更高的新阶段

中美的竞争更趋激烈，半导体成为关键热点。因为获得英伟达高端 H100 和 H200 芯片受限，迫使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建立云计算业务，一些企业创始人甚至通过入籍，以便获取更高的算力。全球技术水平较高的芯片制造能力集中在单一地区，台积电生产了接近90%的高端芯片，这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结构性脆弱点。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要道

3月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成为数十年来对全球能源市场冲击最大的单一事件。美伊冲突发生前，每天约25%的海运石油和19%的液化天然气经由该海峡运输，到4月中旬，通行量比冲突前水平

低约90%，伊朗对每艘船收取的通行费用可达200万美元。布伦特原油价格升至每桶120美元以上，是年初水平的两倍。冲击还延伸到粮食安全，因为全球约三分之一的海运化肥贸易经由该海峡。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也同样受到影响，这主要与中国台湾对液化天然气的依赖，以及海湾地区在铝供应中的重要角色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参考预测预计，全球增长率下降3.1%，总体通胀上升4.4%。

地缘冲突正在重塑能源贸易地图

欧盟已立法分阶段禁止俄罗斯天然气，禁令计划将于2027年全面生效，从美国、挪威和海湾地区通往欧洲的新液化天然气走廊由此打开。2026年1月委内瑞拉总统被抓，改变了西半球能源流向：此前运往中国的石油正在转入与美国更紧密的供应链。

图表 2

2026年布伦特原油价格



来源: EIA, 2026

当能源安全与大国竞争重叠，现届美国政府表现出采取强硬行动的意愿。一体化全球能源市场正在转向更具区域性和双边性、更多由战略结盟而非价格决定的格局。

供应链：为应对波动而重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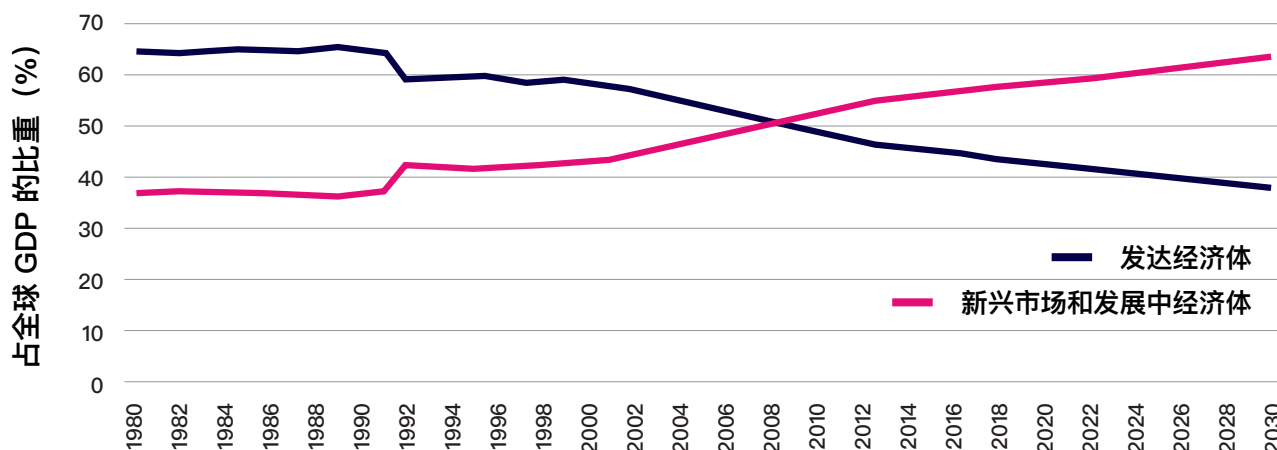
以效率为首要考虑的供应链时代已经结束，韧性取代成本成为基本原则。疫情期间加快推进的“中国 + 1”模式，已转为“中国 + N”模式：自2014年以来，美国从越南的进口增长了345%，而印度和阿联酋在2024年均跻身全球绿地投资目的地前五位。企业如今将确保多元化视为持续性投入，并把更高成本作为保障连续性的代价。关键矿产成为下一压力点，中国烧结永磁体产量占全球的94%，而这些关键材料对生产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和防务系统都不可或缺，集中风险主要存在于信息透明度最低的第二级和第三级供应商。

从规则走向关系

WTO 的权威进一步衰落，造成更深层的结构性损伤。其上诉机构仍处于停摆状态。成员未能在2026年3月部长级会议上延长“电子商务免征关税暂停令”，这是自1998年以来首度未能续期。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碎片化的架构：有针对性的双边协定、特定行业协定，以及中等强国影响力的上升。阿联酋、印度和新加坡等中等强国承接了被重新导向的贸易流。新的非结盟多边主义正在形成，南南贸易目前占全球贸易流量的35%，已超过北北贸易，悄然地取得极大进展，这也因为得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AfCFTA）以及扩展中的金砖合作机制加持。

图表 3

1980–2030年全球GDP占比（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来源: IMF, 2026

关键要点和建议

关键要点

- **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并未停摆，但其规则已经发生根本变化。**WTO争端解决机制无法正常运转，“电子商务免征关税暂停令”已失效，接近五分之一的全球进口商品目前受到关税或类似措施影响。仍以多边框架作为贸易政策主要参照的企业和政府，无异于拿着一张已经过时的地图来应对今天的贸易格局。
- **如今关税既是贸易工具，也是外交政策手段。**美国在最高法院裁决后快速切换法律工具，表明其政策方向是提高壁垒、增加不确定性，并更以政治驱动贸易政策。单一法院裁决难以改变这一方向，政策波动已成为预期的一部分。
- **韧性已取代效率，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基本原则。**虽然还没有完全落实执行，但多数行业 and 地区的战略意图已经十分明确，运营现实是多元化需要时间，替代供应链建设成本较高，关键矿产加工能力也无法迅速形成，设想与执行之间仍有明显差距。
- **中等强国正在积极参与塑造新的贸易秩序。**阿联酋、印度、新加坡和越南通过主动调整定位，承接转移中的投资和贸易流。在竞争性阵营之间保持可信运营的能力，正在成为全球贸易中具有较高价值的战略资产。
- **下一阶段贸易增长将由全球南方推动。**南南贸易已占全球贸易流量的35%，超过北北贸易，且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AfCFTA）和扩展中的金砖合作机制正在强化这些网络，仍主要面向发达经济体市场的企业，可能错过全球贸易地理格局中一项重要的结构性变化。

建议

- **动态评估各主要贸易走廊的关税风险。**在税率、法律工具和贸易伙伴关系可能于数周内变化的环境中，静态关税分析已不可取。企业应维护实时情景模型，识别具体产品、供应商或路线在何种关税阈值下不再具备商业可行性，并预先制定可启动的应对方案。政策制定者应发布清晰的自由贸易协定综合利用率指引，帮助企业识别优惠准入长期未被充分使用的领域。
- **审视供应链各层级的关键矿产依赖度。**关键矿产（尤其是稀土、永磁体、镓和锗）的集中风险，主要存在于信息透明度较低的二级和三级供应商。企业应同时审视加工和开采环节对关键矿产的依赖程度。政策制定者应加快签署双边加工能力协议，并为本国及第三方伙伴的精炼基础设施提供清晰的投资框架。
- **将供应链多元化作为持续性投资方针。**“中国+N”模式提供了可参考的战略方向，但其价值取决于执行深度，备选供应商必须具备在压力下扩大产能的能力。企业应定期对替代供应安排开展压力测试，包括测试订单和产能核验，并将切换成本和交付周期纳入风险模型。政策制定者应在采购和投资审查框架中加上供应链韧性标准。
- **在贸易协定谈判结束前积极参与。**随着数字贸易规则、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投资框架和技术标准不断被纳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AfCFTA）、《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定》（DEFA）以及日益增多的双边数字贸易协定，这些制度安排将在未来十多年持续影响市场准入。企业通过行业组织参与谈判，有机会对结果产生实质影响。政策制定者应确保跨国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利益均在谈判中被顾及。
- **将结构化的中等强国策略纳入市场发展规划。**阿联酋、印度、新加坡和越南正在成为新贸易架构的连接枢纽，对标准、物流、金融和数字贸易规则的影响不断上升。企业应评估自身在这些市场的业务布局、合作关系和监管关系。政策制定者应优先完善与中等强国的贸易和投资框架。
- **明确南南贸易走廊策略。**非洲、南亚、东南亚和中东地区之间的贸易增长具有结构性。企业应识别与其行业相关性较高的两至三条南南贸易走廊，评估进入市场的监管和物流障碍，并开始建设需要多年积累的本地关系与市场情报能力。

新贸易新版图

全球地缘政治的断裂并未阻止贸易发展，却改变了贸易格局。贸易规模的表现比外界对动荡局势的判断更具韧性，但贸易商品的构成、贸易参与者以及货物流经的枢纽，正以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变化。

贸易与宏观经济展望

贸易展现的韧性优于从波动表面看来的程度，人工智能相关商品是其支柱，然而美伊冲突仍是主要下行风险。亚洲是全球增长的重要动力，但也承受极严重的霍尔木兹海峡风险。服务贸易增速高于商品贸易，WTO预计，全球服务出口将在2026年增长4.8%、2027年增长5.1%；商品贸易增速则从2025年的4.6%降至

2026年的1.9%，随后于2027年温和回升至2.6%。其中数字交付服务的增速最快。

宏观逆风更多由地缘政治而非经济周期引致

有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IMF把2026年全球通胀预测上调至4.4%，预计2027年回落至3.7%。截至2026年4月，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3.5%–3.75%，市场目前预计欧洲央行和英格兰银行即将加息，扭转此前预期的宽松路径。避险资金流强化了美元走势，使以美元负债的经济体面临更紧的金融条件，并提高新兴市场的大宗商品进口成本。202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11%至1.49万亿美元，但科技领域是例外，数字经济投资翻倍，数据中心、半导体和信息通信技术正在重塑贸易走廊。

人工智能相关商品激增

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包括半导体、处理器、服务器和成品计算机等，已成为本十年商品贸易的主流。2025年，人工智能相关投资贡献了接近一半的商品贸易增长。按贸易量计算，此类商品目前占全球贸易的15%，但在2025年上半年贡献了全球贸易增长的43%。人工智能相关商品的增长正在改变哪些国家和贸易走廊在全球贸易中有更大的影响力，以及哪些地区相对落后。

不过，高端芯片制造仍高度集中在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美国则在设计和知识产权领域占据关键地位。中国正在建设替代产能，但在前沿技术方面仍有数年差距。东盟正在成为备选制造基地，截至2024年，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贡献了全球半导体出口增量的近30%。随着政府和企业围绕人工智能部署重构生产、服务和基础设施，对人工智能硬件及其承载的数字服务的需求将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围绕相关供应链控制权的地缘政治竞争也将加剧。

DMCC 2026年大宗商品贸易指数

大宗商品贸易指数（CTI）第五版从三大标准对十个主要大宗商品枢纽进行评估：商品禀赋因素、位置与贸易伙伴因素、制度因素，指数由十项等权重子指标构成。鉴于这一时期波动较大，本版改用“即时预测”估算，参考了IMF高频货运数据和更新后的WTO关税信息。有关方向性的结论具有颇高参考价值，但具体得分宜谨慎解读。

2026年大宗商品贸易指数结果

国家及地区	商品禀赋因素
美国	67%
阿联酋	61%
荷兰	9%
瑞士	17%
中国香港	10%
新加坡	4%
英国	17%
中国	37%
南非	15%
尼日利亚	43%

位置与贸易伙伴因素	制度因素	2026年指数得分
36%	67%	57% ↓
19%	61%	47% ↓
69%	63%	47% ↑
42%	73%	44% ↓
35%	85%	43% ↑
43%	77%	41% ↓
30%	61%	36% ↓
0%	49%	29% ↓
6%	40%	21% ↑
11%	0%	18% ↑

箭头表示相较2024年指数的百分比变化

美国已在连续三期报告中成为表现最为突出的大宗商品枢纽，得分为57%，较上一版下降2个百分点。其优势主要来自商品禀赋和制度因素（两项均为67%）。在十个枢纽中，美国石油出口指标得分较高，并在农产品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不过，美国的位置与贸易伙伴因素得分从54%大幅降至36%，主要原因是2025年4月“解放日”政策实施后，主要贸易伙伴采取了关税反制措施。

阿联酋以47%的得分保持第二位，其在各个标准的表现较2024年更为均衡。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使海运出口面临更多挑战，其商品禀赋得分从77%降至61%，然而阿联酋因为富查伊拉和豪尔费坎的韧性，使得货物能够绕开海峡重新规划路线。阿联酋的制度因素得分保持较强表现，企业税制吸引力在各枢纽中最为突出。

荷兰的提升幅度最大，从第六位升至第三位，主要得益于新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贸易便利化数据来源，以及其对美大宗商品贸易占比较低，因此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瑞士降至第四位，尽管贵金属贸易正向亚洲交易所转移，英国凭借制度优势仍位列第七。中国以29%的得分保持第八位，虽然它在稀土和关键矿产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但中美关税摩擦对其得分形成一定影响。

贸易构成正在变化

影响最为深远的变化，不在于商品流向何处，而在于交易什么，三项不断强化的结构性变化正在推动这一趋势：服务正在超过商品，成为贸易增长引擎；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在商品贸易中的占比显著上升，以至改变了贸易整体面貌；与此同时，价值创造正日益向无形资产转移，知识产权、数据、软件和品牌等无形资产，正与有形商品一样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对象。2025年上半年，半导体、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硬件贡献了接近一半的商品贸易增长。跨境数据流、电商和云服务规则，如今在贸易谈判中的重要性已与关税表相仿。

人口结构正在重塑需求

预计到2030年，全球中等收入群体将超过世界人口的一半，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和拉丁美洲，这将成为高价值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关键驱动力。与此同时，欧洲和东亚人口老龄化正在推动消费转向医疗保健、医药和专业服务。消费需求重心正明显向新兴市场转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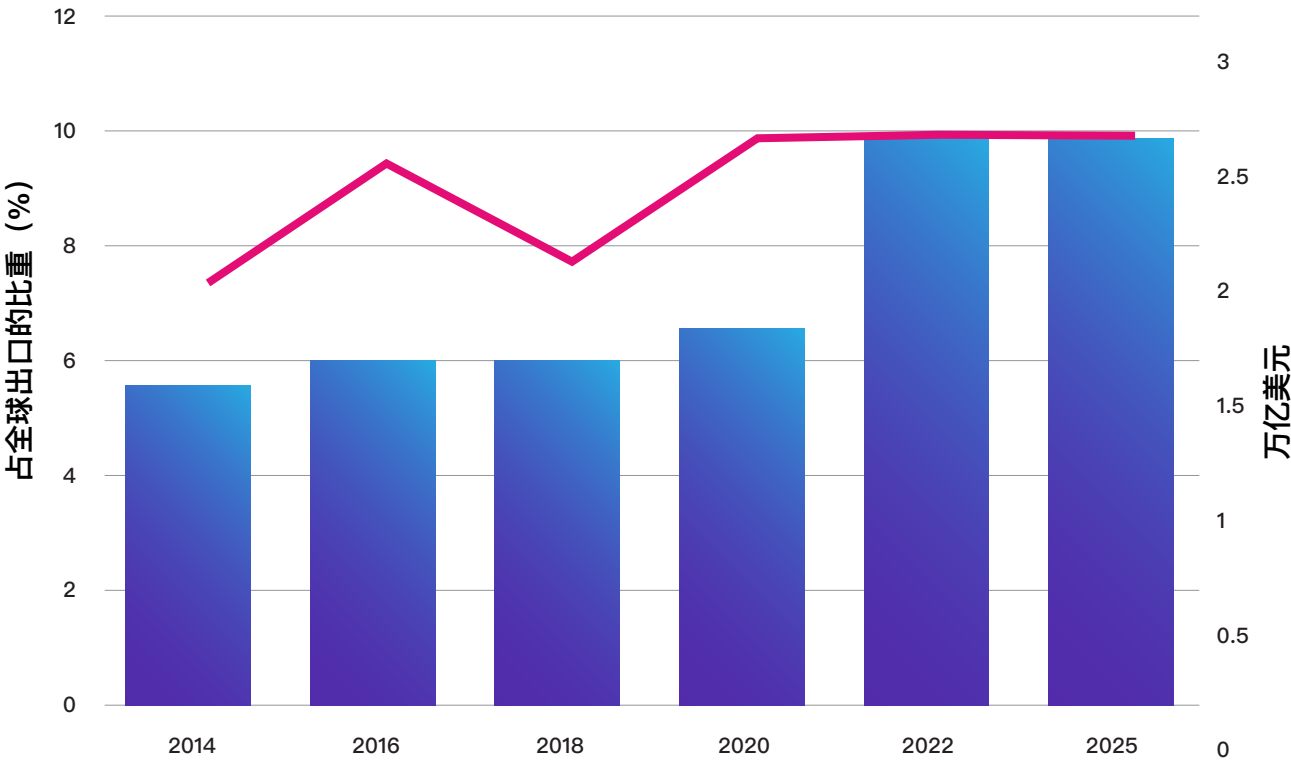
贸易融资：2.5万亿美元缺口

贸易融资缺口没有继续扩大，但也没有缩小，仍维持在2.5万亿美元的 水平，这对中小企业和发展中经济体企业的影响最为突出。核心障碍是复杂性，融资机构多次指出，贸易融资难以被打包为适合投资者的产品。

科技正在缩小这一缺口。美元可在数秒内通过链上系统转移，从而减少资金在流程各环节被卡住，但规模化应用仍面临挑战。到204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106万亿美元，并逐渐成为形成竞争差异的重要因素。电网容量限制已导致数据中心建设放缓，而网络互联不足则制约着增长最快市场的发展。

图表 4

2014–2025年全球贸易融资缺口



来源: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23;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25

■ 万亿美元 — 占全球出口的比重 (%)

关键要点和建议

关键要点

- **贸易展现的韧性，优于从地缘政治波动表面看来的程度。**整体增长数据仍保持稳定，但若剔除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则明显偏弱。能够把握下一阶段贸易增长的企业和经济体，已经认识到贸易构成发生结构性变化，并据此重新布局。
- **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代表着全球商业的当下。**数字交付服务的增速已高于其他贸易活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增速差距仍在扩大。管理跨境数据流、数字服务和电商的监管框架，在战略层面带来的影响已与关税表相仿。
- **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已成为商品贸易增长的关键驱动力。**2025年上半年，半导体、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硬件贡献了接近一半的商品贸易增长。先进芯片生产高度集中，以及支撑其生产所需关键矿产加工能力的集中，构成了全球供应链的结构性脆弱性，而出口管制和产业政策非但未能缓解这一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脆弱性。
- **2.5万亿美元的贸易融资缺口已不再持续扩大，但也尚未缩小。**中小企业和发展中经济体企业仍承担着不成比例的融资压力。弥补这一缺口所需的技术已经具备，但要实现大规模应用，仍需加强监管协调、制度支持和基础设施投资，而这些条件目前仍显不足。率先解决融资可及性问题的贸易枢纽和贸易走廊，将有望获得未来贸易增长中更大的份额。
- **基础设施正成为竞争差异的重要源头。**到2040年，106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并非抽象数字。电网容量限制已经拖慢部分主要市场的数据中心建设，数字连接能力不足也在限制中等收入群体增长较快地区的贸易发展。当前的投资决策将影响未来二十年全球商业的地理分布。



建议

- **审视贸易组合中的服务和数字业务敞口。**仍以商品贸易为主的企业，应评估收入、利润率和增长中有多大比例来自服务和数字交付产品。政策制定者应在双边和区域谈判中优先处理服务贸易条款，尤其是数据流和数字市场准入，不应将其置于商品贸易承诺之后。
- **将人工智能相关供应链敞口纳入战略风险框架。**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对商品贸易增长日益重要，意味着各行业企业日益暴露于半导体供应链风险、出口管制波动，以及围绕芯片产能的地缘政治竞争。企业应梳理人工智能相关零部件和基础设施在供应链中的布局，识别二级和三级供应商层面的集中度风险，并针对可能带来最大运营风险的情景制定备用采购安排。
- **在贸易融资可及性差距演变为竞争力差距前采取行动。**企业应将现有贸易融资安排与新兴数字平台进行对比。相较于传统代理行体系，这些平台能提供更快的信贷决策、更低的文件要求，并为中小企业提供更便捷的融资渠道。政策制定者应加快法律和监管改革，使数字贸易文件在主要贸易司法辖区获得与纸质文件同等的法律效力，并与开发银行合作，部署混合融资工具，降低服务不足市场的贸易融资风险溢价。
- **把基础设施完备程度纳入市场进入和投资选址决策。**能源供应、电网可靠性、数字连接和物流网络质量，已成为贸易基础设施规划的主要考虑因素。企业在决定贸易运营地点、供应链节点建设地点或市场扩张方向时，应将基础设施评估与传统指标一并纳入审视标准。
- **关注将影响贸易增长的人口需求变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为全球贸易带来重要需求机会。目前仍主要面向发达经济体消费者的企业，应识别其本行业相关的高增长人口市场，并开始建设市场情报、监管关系和分销能力。政策制定者应确保在此等高增长潜力市场，其贸易和投资框架的发展与其不断上升的战略重要性并驾齐驱。

科技分化

全球贸易中最关键的分水岭，已不再是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也不再是大型企业与小企业之间，而是那些能够实现技术规模化应用的主体与未能做到这一点的主体之间。

人工智能：跨越临界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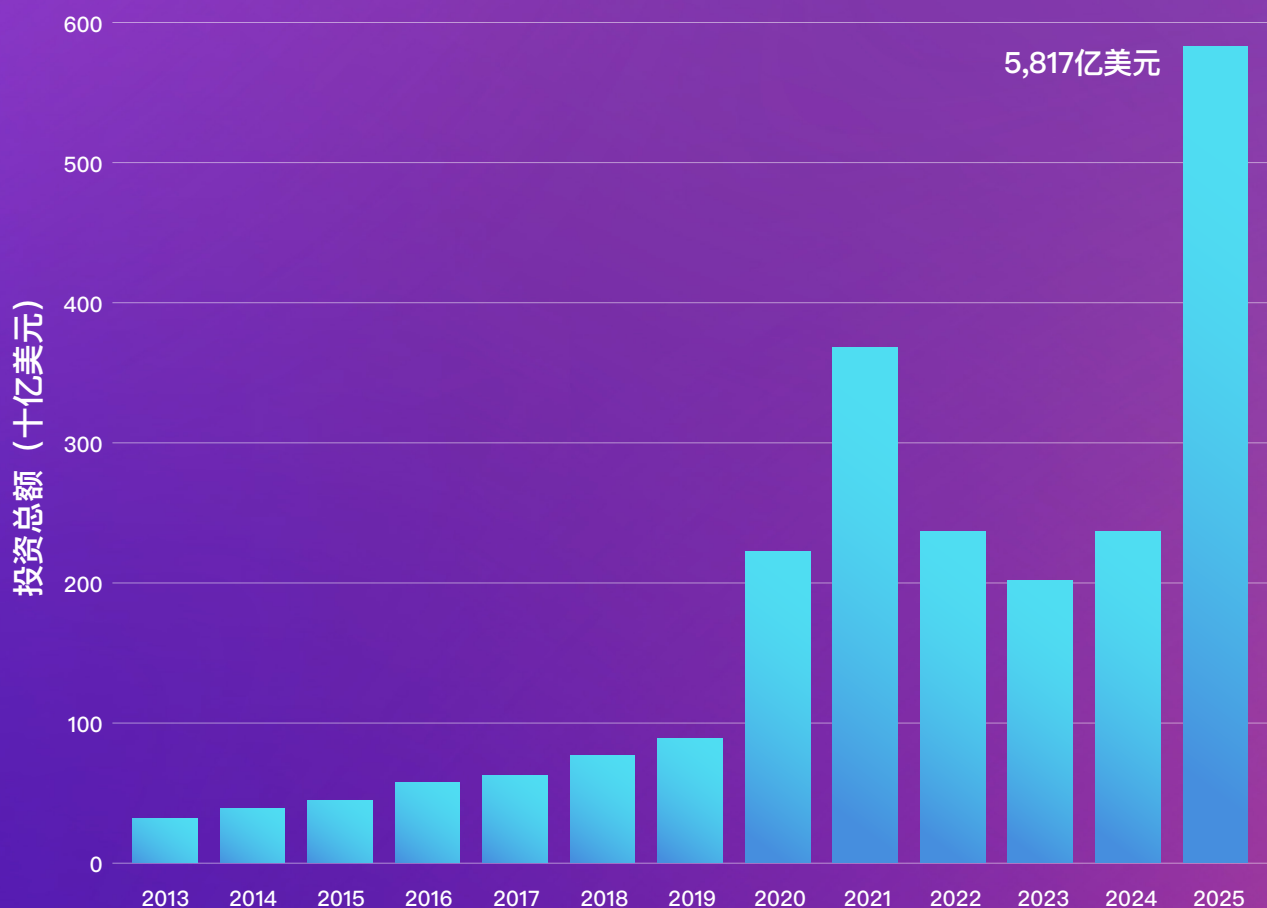
人工智能已经跨越了实际应用的不可逆转节点。它正在物流、海关、港口、制造业和贸易融资领域实现规模化部署，并在成本、供应链可视性和市场覆盖方面带来可衡量的收益。人工智能对贸易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展开：生成式和预测式人工智能（2020年代初至2025年）、代理型人工智能（2025–2030年）以及物理人工智能（2025–2040年）。预计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为全球经济贡献超过15万亿美元，WTO模拟推算显示，到2040年，它可能推动全球贸易增长34%–37%，令GDP增长12%–13%。人工智能相关贸易已成为重要增长引擎，其中半导体和数据中心设备的出口额约占去年全球贸易增长总额的三分之一。

支撑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体系同样处于竞争博弈中

模型可以复制，但用于训练和运行模型的实体基础设施难以复制。高端芯片生产高度集中，美国在市值方面占据优势，东盟则正在成为备选制造基地。数据中心以14%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增长，但电力供应却成为制约因素。电网容量限制、制造地区水资源短缺，以及中国在关键矿产加工领域的集中度，影响着人工智能产能的布局地点及其建设成本。算力获取已然成为一个独立的战略性议题。

图表 5

2013–2025年全球企业在人工智能的投资



来源: HAI, 20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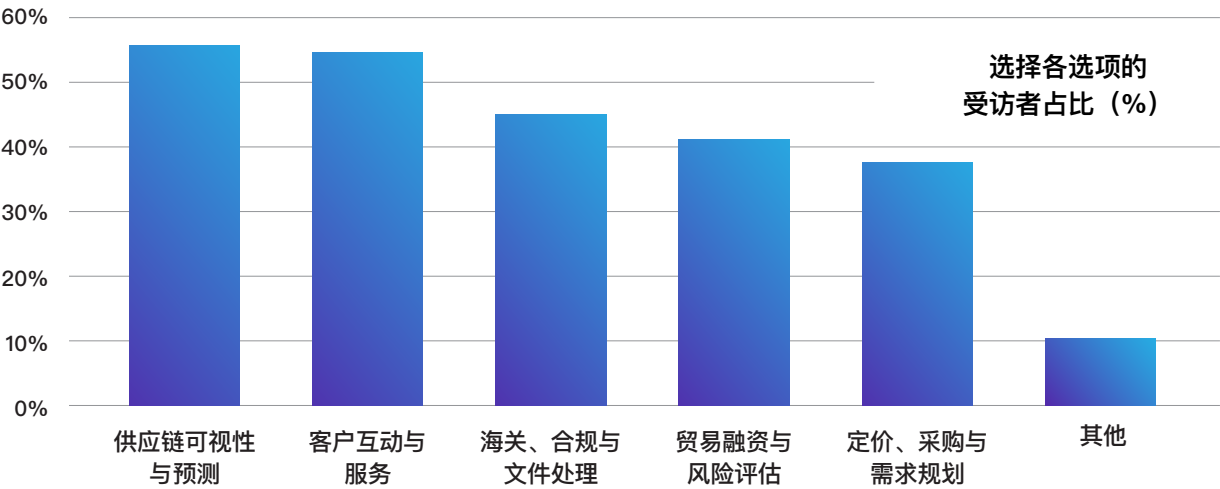
人工智能应用程度仍不均衡，市场调整是现实风险

认为自身人工智能应用已实现全面集成或具有变革性的企业不足15%，超过25%的企业仍处于观察阶段，或完全未采用。阻碍人工智能应用因素主要是结构性问题：数据质量与互操作性（46%）、监管不确定性及跨境数据规则

（44%）、遗留系统整合问题（39%）、网络安全（39%）。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预计，未来三年人工智能和科技股市场可能出现调整，若这一情况发生，将减缓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速度，并缩小基准情景与最差情景的差距。

图表 6

人工智能目前在哪些贸易相关流程中更具价值？ (可多选)



来源: DMCC Future of Trade Survey, 2026

赋能科技体系

人工智能并非单独运作，传感器与物联网、5G 和新一代连接技术、边缘计算、区块链和机器人技术，是助力人工智能创造价值的基础。正如一位参加《贸易的未来》迪拜圆桌讨论的人士所指出，只有嵌入商业模式和供应链，此等技术才能独立创造价值。工业机器人安装量明显增长，并集中于少数大型市场。自主系统也正在重塑物流和货运的面貌。愿景与实际应用之间的差距仍然明显：技术已经存在，但整合、标准和技能仍相对滞后。

崭新金融基础设施

超过90%的贸易交易仍依赖纸质单据，每天有超过40亿份文件在系统中流转。采用电子提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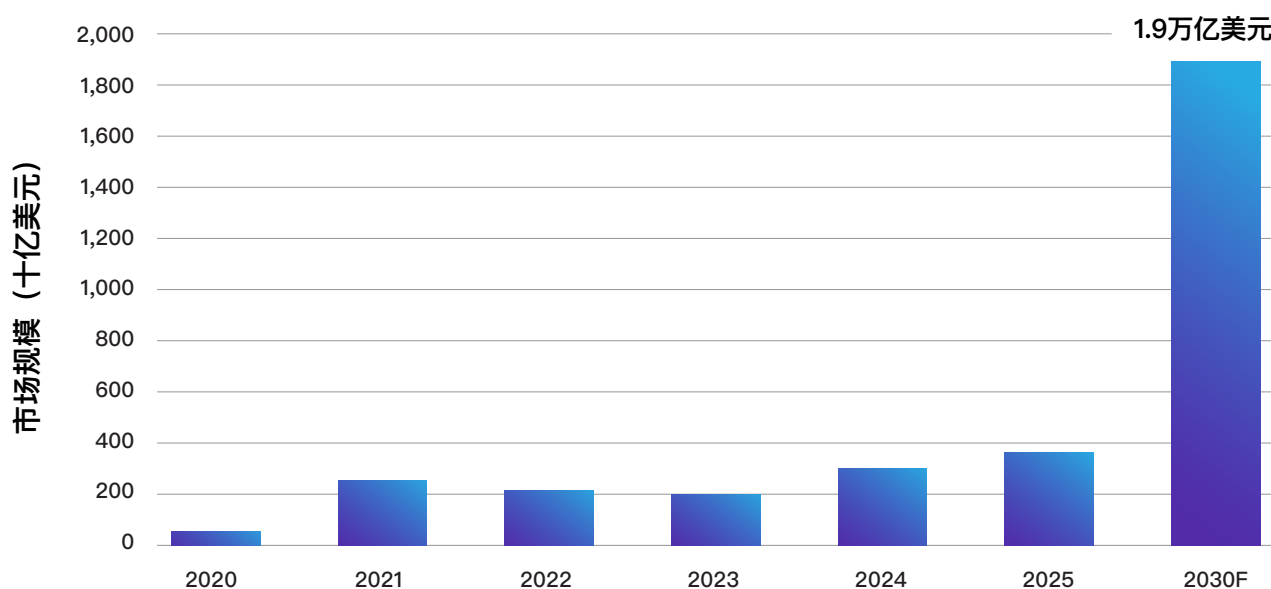
(eBL) 可节省65亿美元，并释放多达400亿美元的新增贸易额。在法律改革推动下，尤其是英国《2023 年电子贸易文件法》实施后，电子提单签发比例从2021年的1%提升至2025年8月的11%，各大承运商计划到2030年实现全面采用。如今，制约这一进程的已不再是法律问题，而是互操作性问题。

新一代金融基础设施正从概念验证走向实际部署

跨境支付仍然缓慢且费用高昂，结算周期通常需两到五天，部分非洲贸易通道的费用高达7%–20%。印度统一支付接口 UPI、巴西 Pix、肯尼亚 M-Pesa 等即时支付系统，以及 Wise 等金融科技企业，正在绕开传统代理行体系进行资金流转。

图表 7

2030年数字货币市场规模估算（基准情景）



来源: Citi, 2025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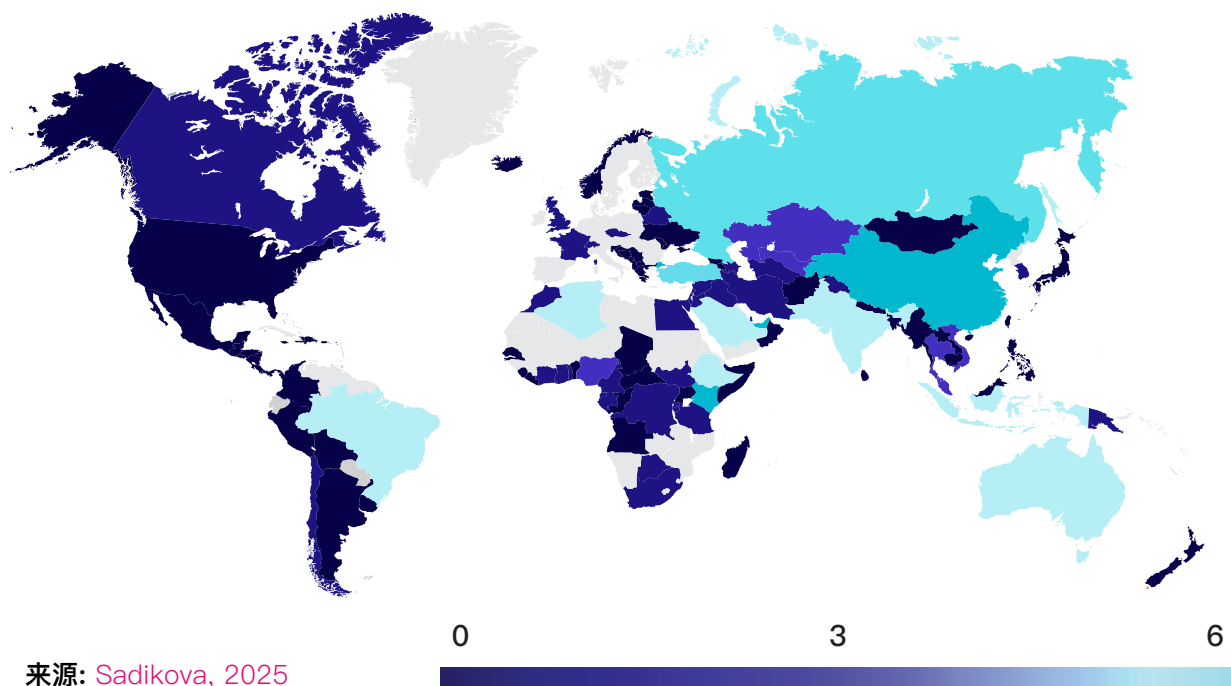
数字货币供应量从2020年不足300亿美元，激增至2026年初的超过3,000亿美元。花旗银行预测，2030年数字货币的发行规模可能达到1.9万亿美元。2025年数字货币实际支付量约为3,900亿美元，是上一年的两倍以上，其中B2B支付额同比增长733%。现实世界资产数字化的规模在三年内增长了380%，达到240亿美元；目前，占全球GDP 98%的137个国家及地区正在探索央行数字货币（CBDC）。连接中国、阿联酋、中国香港、泰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是一个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平台，已处理超过4,000笔交易，总额达555亿美元。尽管发展方向已经明确，但多数部署仍局限于封闭网络，支撑全球规模所需的互操作性尚未形成。

数据：看不见的壁垒

跨境数据流动正日益与国家战略利益挂钩，超过80%的企业认为，数据本地化规则对贸易构成了重大或中等程度的制约。数据无法自由流动时，人工智能发展会放缓，云服务将面临市场准入壁垒，供应链可视性也会下降。数据流规则正变得更严格、更碎片化，目前超过三分之二的措施涉及直接禁止数据向境外传输。随着WTO的“电子商务免征关税暂停令”失效，数字贸易多边框架实际上已难以发挥作用，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增加的双边和区域协定，包括《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欧盟－新加坡数字贸易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以及东盟即将推出的《数字经济框架协定》（DEFA），这些协定各自制定了不同的规则。在这一背景下，那些拥有灵活数据架构并能够适应不同监管体系的企业和经济体，将占据更有利的竞争位置。

图表 8

2025年各国数据本地化措施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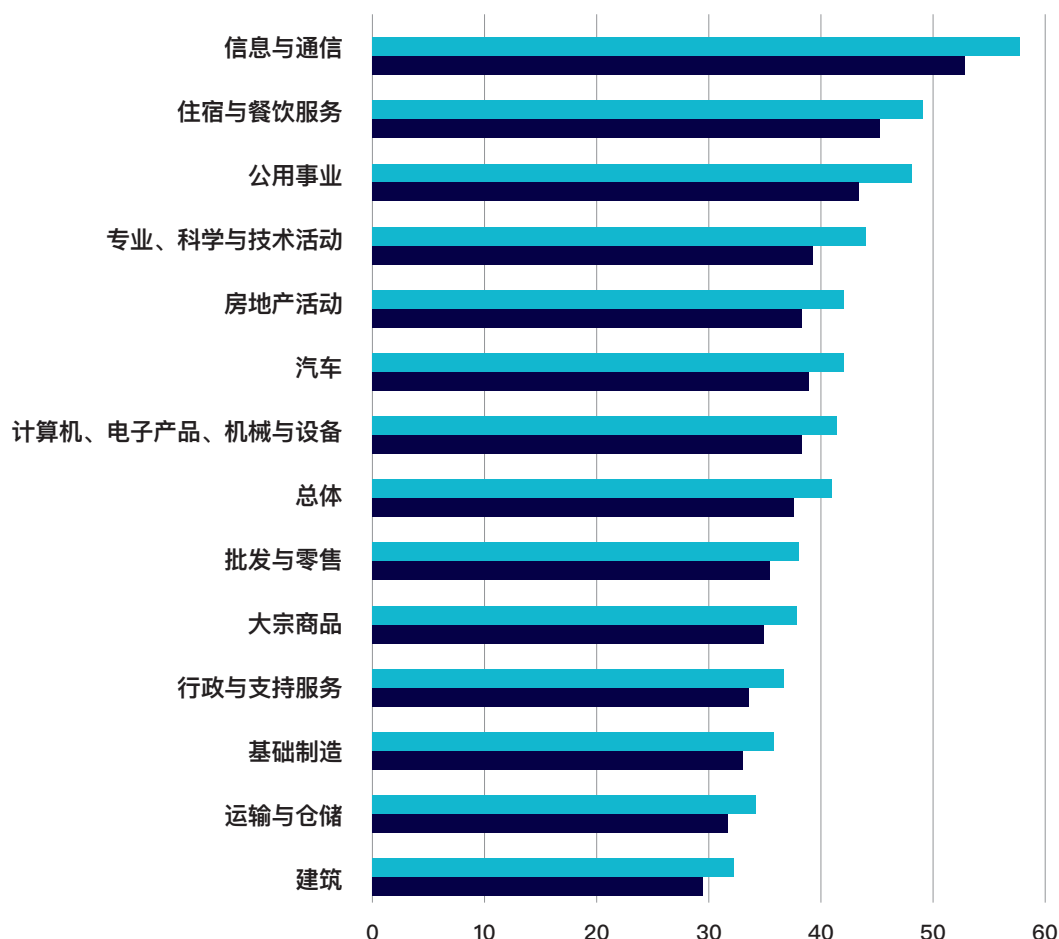
DMCC 2026年行业数字化指数

数字贸易增速高于整体贸易，估计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1.9%。行业数字化指数（IDI）通过四个方面探讨各个行业的数字化程度：上游（与供应商的连接）、生产（内部流程）、下游（与客户的连接）以及数字基础设施（连接能力）。该指数基于欧盟统计局数据，假设发达经济体中数字化程度较高的行业总体上具有一致性，即使其实际水平可能有差异。此外，指数中部分变量已经更新，以提高人工智能采用情况的权重。

2026年行业数字化指数（IDI）整体有所提高，但各项得分的差异仍较大。“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程度较高的领域（58），主要得益于宽带普及以及较多企业报告未发生信息通信技术安全事故。“生产”仍是数字化程度最低的领域（29），但受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应用加速的推动，其得分显著提升了8个点。在行业层面，“信息与通信业”得分最高（57），“建筑业”的数字化程度最低（32），这主要受限于其生产及下游环节的薄弱表现。人工智能应用率从建筑业的7%到信息与通信业的61%不等。与美国数据对比表明，即使实际水平不同，但各行业的发展趋势在不同地域具有普遍的一致性。

图表 9

DMCC行业数字化指数（IDI）各行业得分（1–100，100表示实现全面数字化），2026年与2024年得分



来源: Eurostat, OECD, Cebr analysis 2026 2024

人工智能带来效率与包容性，但其发展并不均衡

在采用人工智能的企业中，70%的企业预计人工智能将在物流领域实现成本节约，80%的企业预计其可降低合规成本，86%的企业则预计能够降低通信成本。人工智能也正在降低中小企业参与全球贸易的门槛——例如，eBay的机器翻译项目使美国对西语拉美市场的出口量提升了

17.5%，其效果相当于将地理距离缩短了37%。

然而，人工智能带来的收益分布并不均衡：超过90%的人工智能专利仅集中在五个行业；WTO模拟显示，在基准情景下，高收入经济体的GDP增幅可达14%，而低收入经济体仅为8%。要缩小这一差距，各国需要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相关政策，尤其需要在数据和人工智能规则方面加强国际协调，因为这些规则是释放人工智能收益的关键基础。

关键要点和建议

关键要点

- **人工智能已跨过不可逆的运营节点，但生产力鸿沟正在扩大。**人工智能不再停留于试验阶段，正在物流、海关、港口、制造和贸易融资领域规模化部署，并在成本效率、供应链可视性和市场覆盖方面带来可量化的益处。然而其应用普及程度仍明显不均：不足15%的企业认为自身人工智能应用已全面整合或具有变革性意义，超过25%的企业仍处于观察阶段或完全未采用。人工智能应用的先行者与落后者的差距已经显现，随着代理型人工智能（agentic AI）在未来三到五年内从试点走向实际生产应用，这一差距必将进一步扩大。
- **支撑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体系，与人工智能技术一样身处战略博弈之中。**模型可以复制，但规模化训练和运行所需的实体基础设施无法轻易复制。芯片出口管制、数据中心扩张面临的电网容量限制、人工智能制造地区水资源短缺，以及中国在关键矿产加工领域的集中度，这些因素都在实际影响着人工智能产能的构建地点及其成本。
- **新一代金融基础设施正从概念验证走向实际部署阶段。**数字货币和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CBDC）已经在实际贸易通道中协助进行交易结算。2025年B2B数字货币支付规模同比增长733%。2025年11月，首笔基于mBridge平台的跨境CBDC交易成功完成。四年内，电子提单签发比例从1%提升至11%。发展方向已经明确，但多数部署仍运行于封闭网络之中，各司法辖区监管框架仍不一致，支撑这些系统全球化运行所需的互操作性尚未形成规模。
- **跨境数据流动正日益与国家战略利益挂钩。**调研中超过80%的企业认为，数据本地化规则是跨境贸易的重要或中等制约因素。数据无法自由流动时，人工智能发展会放缓，云服务将面临市场准入壁垒，供应链可视性也会下降。那些拥有灵活数据架构并能够适应不同监管体系的企业和经济体，在数字贸易中更有竞争力。
- **数字贸易多边框架实际上已难以发挥作用。**随着WTO的“电子商务免征关税暂停令”于2026年3月到期，意味着数字贸易领域的唯一一项普遍适用的多边承诺也随之失效。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增加的双边和区域数字贸易协议，各自针对数据流、电子文件、数字身份和电商治理设定相应的规则。企业和政府必须参与这些谈判，以影响最终结果，否则只能被动接受既定结果。

建议

- **对核心贸易业务开展有条理的人工智能成熟度审视。**企业应梳理人工智能在海关归类、需求预测、制裁筛查、贸易融资和物流优化中的应用情况，识别当前部署与行业顶尖水平之间差距较大的环节，并优先在这些领域进行规模化投资。政策制定者应为贸易密集型行业建立人工智能就绪度基准，并将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投向应用差距较大的贸易通道和市场。
- **对云服务商、芯片供应商、数据中心运营商及能源供应等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进行依赖关系压力测试。**企业应查明哪些人工智能工作负载依赖单一供应商或司法辖区，将关键工作量分散到多个基础设施提供方，并在规划人工智能相关业务的选址或扩张时，将能源可用度和电网接入时间纳入考量。政策制定者应将数据中心、电网容量和半导体供应链等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视为国家战略基础设施，并据此进行规划。
- **立即建立双轨支付能力。**阿联酋、新加坡、中国香港和英国均已推出或正在制定数字货币监管框架，为机构提供较明确的采用规则。企业应在成熟贸易通道中维持代理行体系，同时在银行服务摩擦最高的市场试行数字货币结算。政策制定者应加快推进数字货币储备、互操作性标准和央行数字货币（CBDC）通道建设方面的监管协调。
- **在进入新市场前，评估数据本地化的风险。**企业必须明确，哪些司法辖区要求贸易相关数据需在本地存储或处理，评估现有基础设施能否满足这些要求，并将模块化设计作为新系统开发的标准要求。政策制定者应在双边贸易谈判中优先处理数据流相关条款，并推动互认框架以降低合规负担。
- **按明确时间表推进贸易文档数字化。**企业应针对主要贸易通道设定电子提单（eBL）、数字信用证和无纸化海关申报的内部目标，并为暂不具备独立合规能力的供应商提供过渡性支持。政策制定者应在主要贸易司法辖区扩大电子提单的法律等效性，统一数字签名和电子合同框架，并在服务不足的贸易通道中，利用发展融资协助中小企业数字化。
- **在数字贸易协定谈判结束前积极参与其中。**企业应通过行业组织参与涉及其主要贸易通道的谈判，重点关注人工智能治理条款、数据流承诺和电子贸易文件标准。政策制定者应将数字贸易协定谈判视为与关税表同等重要的战略事项。

清洁能源： 产业优势之争

能源转型已被重新定义，从一项气候议程转变为一场产业与安全领域的较量。过去被视为气候投入的支出，如今被视为安全投资。这种重新定位正在推动比以往气候框架下更明显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更具单边色彩的产业战略，以及更快的清洁技术供应链碎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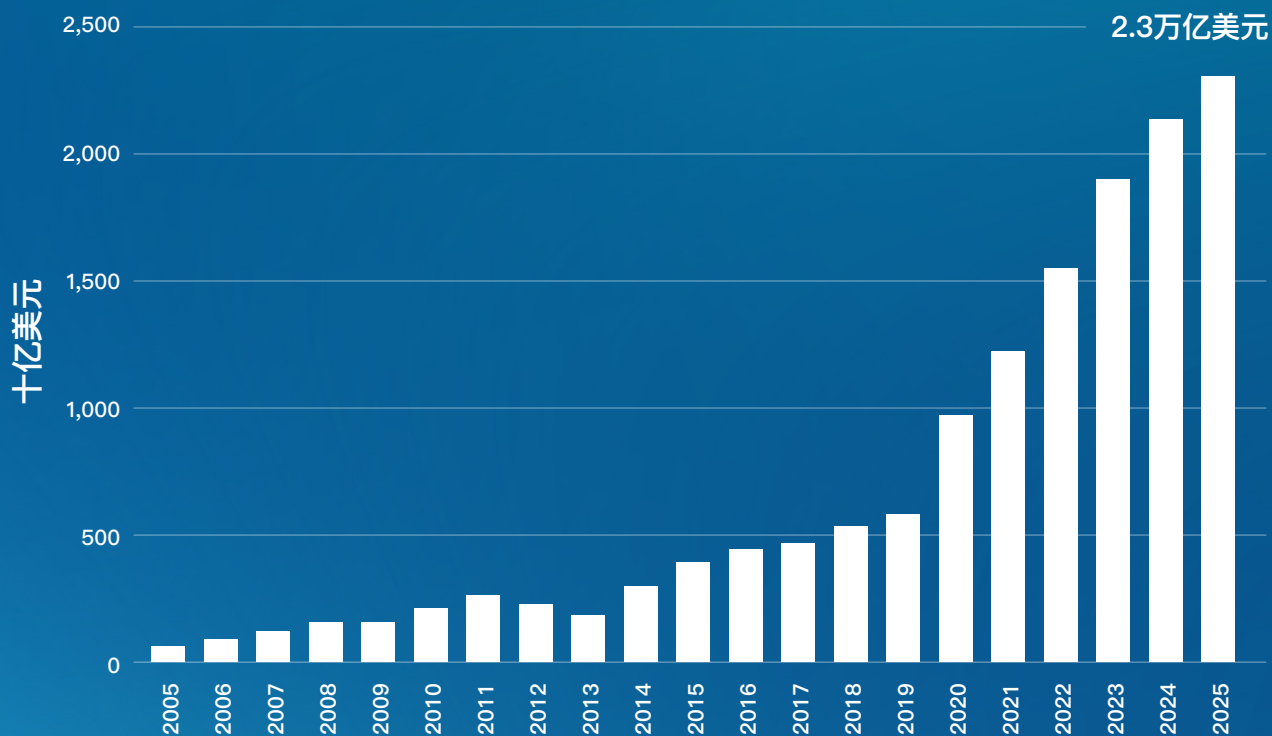
投资能源转型：四种策略，一场竞赛

向后碳经济转型，是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资本再配置之一。2025年，全球低碳能源转型投资达到了2.3万亿美元，较2024年增长8%，预计未来五年更将达到2.9万亿美元。

全球能源转型投资在地域上也趋于集中。亚太地区吸纳了近一半的资本。在2025年，中国投资了8,000亿美元；欧盟的投资增长18%，达到4,550亿美元，美国投资增长3.5%至3,780亿美元。印度能源投资总额达到1,500亿美元，并提前五年实现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占比50%的目标。

图表 10

2005–2025年全球能源转型投资



来源: Bloomberg NEF, 2026b

美国投资回落

截至2025年底，企业已取消或缩减了61个清洁能源项目，总额达到348亿美元，接近新公布项目价值的三倍。这也是有记录以来首次出现清洁能源投资流出美国超过流入的情况。2025年上半年，美国可再生能源投资下降了36%，而欧盟投资则增长63%。

中国持续推进

中国已将能源转型转化为制造业战略，通过结合国有与民营资本、承担先行者风险，并开展规模化建设。2024年，全球清洁技术（clean-tech）制造工厂投资的76%流向中国。目前，中国在主要清洁技术领域占据全球超过 70% 的制造产能。中国不仅生产清洁能源，也在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

欧洲犹豫不决

欧洲具备发展意愿，但资本不足。中国风力涡轮机价格至少低 20%，尽管欧盟在下游提高关税，但是其上游组件仍在结构上依赖中国。欧盟每年面临约4,77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这一缺口预计到2030年还将进一步扩大。

海湾地区采取对冲策略

海湾国家同时为传统能源体系和新能源体系提供

资金。主权财富基金正将来自化石燃料收入的长期资本投入可再生能源、氢能和关键矿产。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已向约62.9吉瓦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超过377亿美元，目标是到2030年达到165吉瓦，仅阿联酋马斯达尔公司（Masdar）在2025年已投资150亿美元。因此，海湾地区正在成为能源转型中的重要参与者。

谁掌控投入即主导转型进程

关键矿产是当前迫切且尚未充分解决的制约因素。对稀土、镓、锗，以及不断增加的战略矿产清单实施出口管制，体现了一种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影响力。整个价值链从精炼到组装的各个环节，中国均占据重要地位。从发现矿产到投入生产的平均周期为16年，因此供应多元化是针对眼前难题的长期解决方案。电网基础设施已成为制约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五年内电网材料价格接近翻倍，仅德国就需要约8,000亿欧元用于电网改造，而变压器的交付等待时间可长达六年。那些较快解决电网瓶颈的经济体，在吸引清洁技术制造投资方面处于更有利地位。

电动汽车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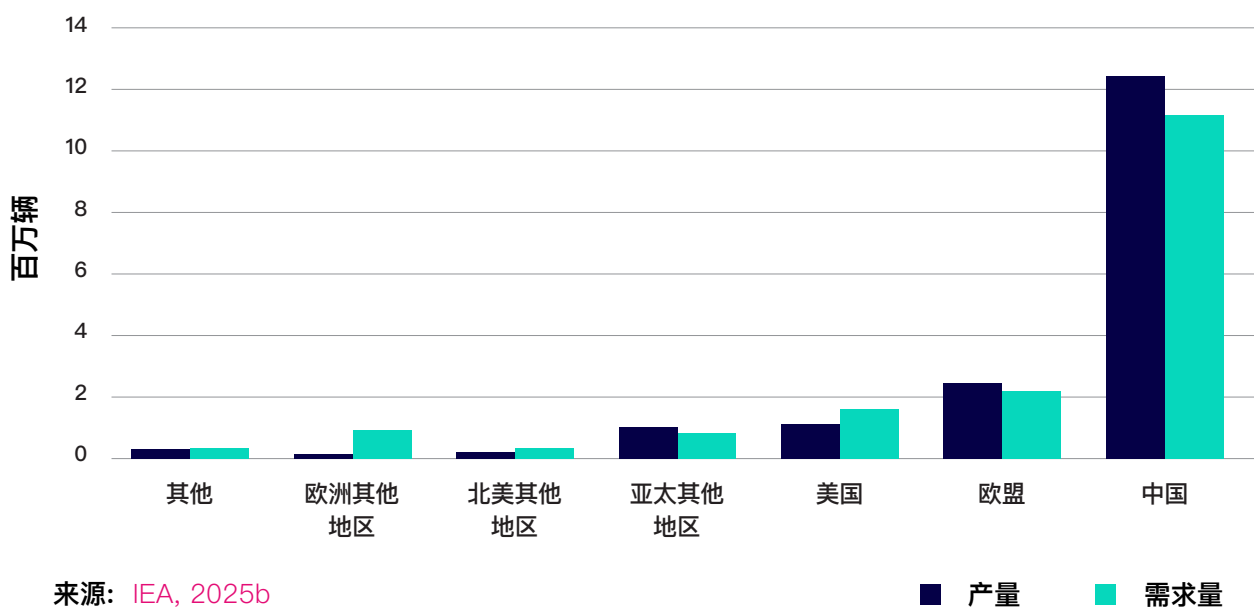
在全球电动汽车市场和支撑该市场的价值链中，中国均占据重要地位。2024年，全球售出的电动汽车中有七成在中国制造，其影响向上游延伸至关键矿产加工领域，向下游延伸至充电基础设施、软件生态系统和融资模式，这些配套要素伴随中国电动汽车进入新兴市场。这一垂直整合优势，是十多年推行协调产业政策的结果。

销售数据体现了这一优势。2025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达到2,100万辆，较2024年增长了20%。截至2024年底，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接近5,800万辆，到2025年已减少每日约230万桶的石油需求。2025年，电动汽车在清洁技术投资中占比独领风骚，车辆和充电基础设施投资达到8,930亿美元。

美国和欧盟已采取贸易壁垒措施作为回应，中等强国则谨慎应对这一竞争。印度、摩洛哥和东南亚多国正在加强电动汽车制造能力，避免完全靠拢任何一方。这些经济体通过吸引寻求生产多元化的西方和中国企业投资，将自身定位为备选制造地点。

图表 11

2024年全球主要市场的电动汽车产量、需求量



当气候政策转化为贸易政策

碳定价仍然不可忽视，但决定战略竞争格局的关键并不在此。调研中42%的企业完全未对其影响进行测算。尽管如此，欧盟自2026年1月起实施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已将碳强度转化为钢铁、铝、水泥、化肥和电力的边境成本，并预计进一步扩大有关范围。目前中国碳排放交易

体系覆盖全球约20%的排放。日本的相关制度自2026年4月起转为强制实施。由此形成的重叠拼凑机制，影响企业的生产布局及其贸易伙伴选择。

对企业而言，碳强度已成为市场准入的重要变量，最佳管理方式是将碳成本测算从可持续发展职能转移至商业和采购规划之中。

关键要点和建议

关键要点

- **能源转型的重心已从气候转向安全。**原有气候议程如今已转变为产业与安全竞争。这一转向正在推动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加剧、更具单边色彩的产业战略，以及更快的清洁技术供应链碎片化；这些变化的规模和速度，均超过了过去气候政策框架所带来的影响。
- **中国在清洁技术竞争中形成了结构性优势，关税或许可以减慢这一优势，但难以逆转。**中国从矿产加工、电池制造到成品电动汽车形成了垂直整合体系，并拥有正在以工业规模承接转型的电网基础设施，由此形成了成本优势和供应链整合能力。这一体系用了十年才建成，其他经济体若要与之竞争至少也需要相近时间。尽管竞争仍未结束，但能分庭抗争的时间窗口正在收窄。
- **关键矿产是能源转型中迫切且尚未充分解决的制约因素。**对稀土、镓、锗，以及不断增加的战略矿产清单实施出口管制，体现了一种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影响力。推动供应来源多元化是合理的应对方式，但鉴于从矿产发现到生产平均需要16年，因此它是针对眼前问题的长期方案。政府公布的计划与市场实际能够交付的成果存在明显差距。
- **电网基础设施已成为制约清洁技术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一个较为明显的瓶颈是：要使发电能力在产业规模上发挥作用，必须在输电、储能及智能电网方面进行大量投资。较快解决这一问题的经济体，在吸引清洁技术制造投资方面已处于更有利地位。仍在应对过去数十年遗留电网制约的经济体，即便雄心勃勃意图发展可再生能源，正逐渐丧失竞争优势。
- **碳定价固然不可忽视，但战略竞争并非由其左右。**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已将碳强度转化为边境成本，其他地区也在发展类似机制。对于尚未将碳成本测算纳入商业决策和采购规划的企业而言，相关风险敞口正在不断累积，企业最终将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

建议

- **全面梳理清洁技术供应链各层级的依赖关系。**企业应梳理每项关键投入品的加工依赖关系，并识别在精炼环节是否存在过度依赖单一国家的情况。政策制定者应优先推进双边加工能力协议，而非只关注开采协议，并为能够规模化吸引私人资本的第三方伙伴的精炼基础设施，提供清晰投资框架。
- **确定哪些产品线需要“双阵营”采购策略。**太阳能组件、电池、电动汽车零部件和电网设备，日益受到相互竞争的关税制度、出口管制和供应链分化的影响。企业应审定哪些产品线确实面临“双阵营”采购风险，测算平行采购的成本与运营影响，并作出明确决策，而不是一再推迟。
- **在投入资本前，将电网可靠性、接入时间表和电力成本纳入清洁技术制造选址考量。**企业应将电网容量评估作为选址评核的标准组成部分，这包括电网接入排队位置和时间预测。政策制定者应公布清晰、具有约束力的电网接入时间表，并为战略性清洁技术制造投资建立快速审批机制。
- **将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风险敞口纳入采购和商业规划。**企业应对其供应商体系中的CBAM风险进行建模分析，识别在碳成本上升时竞争力下降的合作关系，并在商业条件支持的情况下，与供应商共同探讨脱碳路径。政策制定者应就CBAM机制扩大时间表提供清晰的前瞻指引，使企业有足够准备时间规划供应链转型。
- **将海湾主权资本视为清洁技术供应链的战略合作伙伴。**对于从事物流、大宗商品加工、贸易融资和清洁技术基础设施业务的企业而言，海湾地区连接化石燃料收入与清洁能源投资、跨越竞争性阵营运营，并向供应链节点投入长期资本，因此可形成超越传统融资关系的合作机会。企业应密切关注海湾主权资本在清洁技术供应链中的流向，识别与自身业务的战略重合领域，并在商业利益一致时探索共同投资或合作架构。
- **运用混合融资工具，缩小新兴市场清洁能源股权融资缺口。**发展融资机构和多边银行应优先采用能够降低私人清洁能源投资风险的混合融资结构，重点覆盖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的高增长新兴市场。
- **确立清洁技术标准和互操作性要求。**政策制定者应在当前谈判中的各项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中，将清洁技术标准列为战略谈判重点，并在标准分歧固化成型之前，与贸易伙伴协调建立共同的标准框架。







DMCC

futureoftrade.com

© DMCC 2026